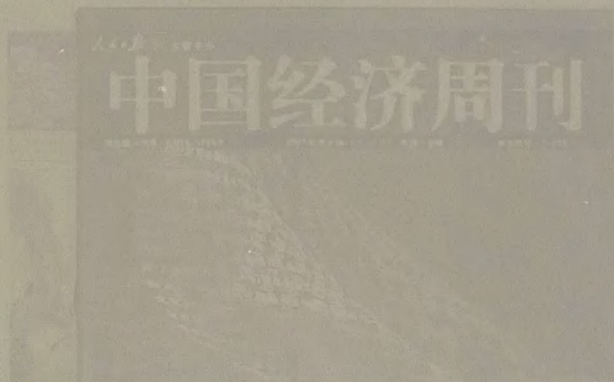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GLOBAL TIMES

天津日报

人民论坛



经济报

中国汽车报

中国海洋石油报
CHINA OFFSHORE OIL PRESS

广州日报

十四大以来

《人民日报》评论研究

◎主编 王武录

巴音郭楞日报

阿克苏日报

鞍山日报

漯河日报

萧山日报

文化时代

同心出版社

国家广电总局社科项目

十四大以来

《人民日报》评论研究

主 编	王武录	
副主编	曾 英	魏 彧
	刘 赞	翟方明
	梁小建	邓晓梅
	张传香	闫永栋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研究/王武录主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716-530-9

I. 十... II. 王... III. 人民日报-评论性新闻-研究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541 号

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研究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 编: 100734

电 话: 发行部: (010) 85204603 (外埠)、85204612 (本市)
总编室: (010) 85204653

E-mail: txcbs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 言

本课题——《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研究》是国家广电总局社科项目之一。

为什么要研究评论？评论是报纸的旗帜，在报纸诸文体中最富舆论影响力。

为什么要研究《人民日报》评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第一大报、世界有重要影响的报纸。国内外高层次读者常常依据《人民日报》评论，分析中国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势，这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要研究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党的十四大政治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经济上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步入了新阶段。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的新闻论述，对国内外大事和现实生活中各种现象进行评说，其思想性、指导性、写作水准，都跃入了新的境界和层次。

本课题从探讨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的特点切入，继而考察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与社会舆论、先进文化的关系，并力求在论述党的喉舌与新闻评论规律时，进入新的层面。

本课题得到了《人民日报》等党报业界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等新闻出版学界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前 言	1
-----------	---

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的特点

一、新闻评论的特点	1
(一) 新闻性	2
(二) 群众性	4
(三) 说理性	14
二、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共党报评论的特点	21
(一) 政治性	22
(二) 指导性	27
(三) 权威性	34
三、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的特点	42
(一)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贯彻落实“三贴近”原则的统一	43
(二)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	52

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与社会舆论

一、评论与社会舆论	66
(一) 媒介与舆论	66
(二) 评论与舆论	70

二、我国当代社会舆论所处的现实背景	71
(一) 亟待应对的国际舆论环境	71
(二) 复杂多样的国内舆论状态	72
三、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引导社会舆论个案分析	76
(一) 围绕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展开的舆论引导	76
(二) 围绕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十五大精神展 开的舆论引导	88
(三) 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贯彻和十六大精神 展开的舆论引导	98
(四) 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展开的 舆论引导	105

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与先进文化

一、先进文化概述	122
(一) 先进性内涵	123
(二) 先进文化建设内容	124
(三) 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125
二、《人民日报》评论与先进文化	126
(一) 党报与文化	126
(二) 《人民日报》在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127
(三) 《人民日报》评论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引导力量	129
三、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引导先进文化建设个案分析	130
(一) “九八”抗洪	130
(二) 批判“法轮功”邪教	139
(三) 抗击“非典”	146
(四)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157
四、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引导先进文化建设的若干侧面	159

（一）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思想保证	167
（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精神动力	168
（三）激励全社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使中国先进文化有高尚的道德支撑	169
（四）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智力支持	172
（五）激励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繁荣先进文化探索道路	173

党的喉舌与新闻评论规律

一、喉舌性质不能变	181
（一）要继续强调党报发挥喉舌功能	182
（二）党报发挥喉舌功能要与时俱进	185
二、新闻规律要遵守	188
（一）由感知新闻特性到感悟新闻评论规律	189
（二）加强和改进党报新闻评论的若干环节	192
后 记	197

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的特点

一、新闻评论的特点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① 人们从戈公振为报纸所下的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一起，构成了新闻媒体的主体。尽管从数量上看，报道要远远多于评论（主要指新闻评论——下同），但评论常常被视为媒体的“旗帜”和“灵魂”，历来受到媒体从业人员和受众的重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首任总编辑邓拓说：“报纸的评论特别是社论决定着报纸的政治面貌。一篇社论是一期报纸的旗帜。”^② 1955年，他在高级党校新闻班讲课时指出：“一个报纸有没有社论，是不是经常有社论，广大读者对社论阅读的情况怎样，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完全没有社论的报纸，是没有政治价值的报纸；与此相反，只有经常发表社论的报纸，才是具有完全的政治性的报纸。”^③

国外报界同样如此。以美国《纽约时报》为例：“它所登载的新闻举足轻重，它的社论足以左右公众意见，继而影响国际政治的方向……敏感的读者一旦对新闻报道有所迷惑，往往向《纽约时报》社论版去找寻指点。”^④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页。

② 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27页。

③ 程世寿、胡思勇：《当代新闻评论写作》，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④ 董鼎山：《解剖〈纽约时报〉社论版》，《环球时报》1998年9月6日第7版。

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研究

评论如此重要，与其自身的特点——新闻性、群众性、说理性，密不可分。

（一）新闻性

作为一种新闻体裁，评论首先要具备该文体的共性——新闻性，这样才能吸引受众的关注。反之，如果不具备新闻性，受众可能会放弃阅读，那就很难发挥作用了。

评论的新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其时效性。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评论则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分析、评判。新闻每天都在发生，评论也应根据每天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及时发出自己的意见，如果看到一个新闻事件后，作者不能及时进行评论，编辑不能及时进行处理，那么当这样的评论发表出来时，很可能受众已经不再关注这一事件，这样的评论也会因时过境迁而成为“马后炮”。换言之，争分夺秒写评论，力争在一个事件刚刚出现或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之时发表评论，至少要在其退出受众视野之前发表，从而及时对其进行解读和评判，这样才能引导舆论，也有利于媒体树立公信力和塑造良好形象。

旧社会中国报馆主笔“看完大样写社论”，我们党根据地报纸主笔代表之一邓拓“日写三论”，圈内人早已知之。虽然他们写的评论，性质、作用、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那样写作，毕竟反映出读者、受众对评论时效性的追求。革命战争年代，条件那样艰苦，我们的党报都那样重视评论的时效性。聂荣臻元帅在一篇纪念邓拓的文章中说：“重要的社论起草后，哪怕是深更半夜，他也单身匹马赶到我的驻地让我过目，共同研究定稿。”^①这是聂荣臻和邓拓分别担任晋察冀边区领导人和《晋察冀日报》总编辑时的一段经历。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

^① 聂荣臻：《光明正大 耿直不阿》，载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人民新闻家邓拓》，人民日报社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所领导的另一份重要报纸——重庆《新华日报》同样注重评论的时效性。该报1945年11月21日刊发的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1946年4月18日刊发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都是针对《大公报》前一天刊登的社论而发，批驳其错误观点，表明我们党的立场，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持党中央机关报评论工作达十年之久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范荣康就此分析道：“这些社论，都是头天《大公报》放了毒，第二天《新华日报》马上出来消毒，把它驳回去。事不过夜，还敬一篇。它在那里骂你，你一天不吭声，两天不言语，三天五天、十天半月都不发言，等于默认，还有什么战斗性？”^①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民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各地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报道，发表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因而大大增强了评论的时效性。很多网上的评论常常针对当天或前一天的事件而发，吸引了大量受众。这也带动了其他媒体对评论时效性的重视和追求。如《北京青年报》推出“今日社评”栏目，针对最新发生的事件或配合当天报纸上刊登的重要新闻，每天发表一篇评论。

评论的新闻性还表现为它的依托性和针对性。与那些“坐而论道”的政论文不同，评论要依托某一具体新闻事件，针对某种普遍社会现象发言，离开这些事件、现象，就失去其现实意义。这一特点既使新闻评论与文学评论、史学评论、政论文章等其他形式的评论区分开来，又赋予它更多的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影响现实的职责。评论写作中常说的“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1919年11月15日，《大公报》报道长沙女子赵五贞因被迫嫁给比她大20多岁的古董商，而在花轿中自刎身亡。时任《大公报》“馆外撰述员”的毛泽东于次日发表评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指出是社会、娘家、夫家三重压力“逼着她求死的”，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

^① 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由于作者既正确引导读者、受众认识赵五贞的自杀，又“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所以该文反响强烈。试想，如果不是依托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去批评封建婚姻制度和社会制度，虽然也能起到一定效果，但决不会像这篇文章一样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①

意见信息与事实信息的融合性，也是评论的新闻性表现形式之一。评论以说理为主，但在说理过程中常常要用一些事实作为由头或论据，这使得它在说理的同时也传达出一定的事实信息。这种事实常常是媒体报道过的，或是一些史料、典故，但也有一些是未经公开报道的新闻事实。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显然后者的吸引力更强。于是一些评论作者尝试把这类事实融入评论中，既传递意见信息，又传递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信息，进而使评论的吸引力大为增强。曾在《纽约时报》任职30余年的台湾学者李子坚在谈及该报社论委员时，这样写道：“他们并不是想象中坐在象牙塔里品评世事。对时事的评论，常要接近最新的事实发展，社论委员一如采访记者，尽量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因此，时报（指《纽约时报》——引者注）的社论委员实在是‘动态’的主笔，不是想象中‘静态’的主笔。”^②可见，《纽约时报》评论员尽量获取新闻材料，并充实到自己的评论中，是该报的成功手法之一，而这又是评论融意见性信息与事实性信息于一炉的佐证之一。

（二）群众性

新闻媒体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作为新闻媒体上的一种体裁，评论同样具备群众性的特点。

这首先表现为评论受众的广泛性。与专业性的论文不同，评论的载体是大众传媒，而大众传媒总是追求受众数量的最大化的，它总是

① 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② 李子坚：《纽约时报的风格》，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217页。

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受众而不是排斥任何受众。这一特点决定了评论在选题、论述时必须考虑到受众现实的心理需求和接受习惯，抓住读者最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正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报刊界评论高手之一——邹韬奋所言：“每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言论’，在下笔之前，要费很多时间考虑什么是当前大多数人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① 同时在论述中也要尽量用受众易于理解的语言、乐于接受的方式加以阐发，借以赢得更多的读者，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像专业论文那样围绕某类专门研究人员才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采用专业术语进行分析，或者像文件那样通篇带有指令性成分，那就会使受众望而却步，削弱评论的社会影响力。

与受众的广泛相联系，评论总是关注群众的思想和心理，有针对性地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说。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很多人为此欢欣鼓舞，但也引起一些同志的疑虑：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又是“高指标”，是不是又“冒进”了？会不会重蹈“大跃进”的覆辙？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帮助下，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回答一个问题——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运用大量事实作论据，打消了读者的疑虑，使大家认识到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目标的科学依据及其可行性，鼓舞起人们为实现它而奋斗的热情。^② 请看该文：

回答一个问题

——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

在讨论十二大文件时，争取在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工农业年总

^① 胡愈之：《人民生活是写作的唯一源泉》，参见1956年5月6日《人民日报》。

^② 范荣康：《待开垦的处女地》，《新闻战线》1984年第1期。

产值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是个最热烈的议题。举国上下，谈翻番，议远景，树雄心，立大志，腾腾热气，令人感奋。

但是，有很少数同志提出：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又是“高指标”，是不是又“冒进”了？他们担心，1958年提出“钢产翻番”，后来发展成“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1978年提出在本世纪末石油工业实现“十来个大庆”等一类口号，结果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论据，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给经济调整增添了困难；现在又提出翻两番，会不会重蹈覆辙？

这些同志提出这种疑问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有人（哪怕是极少数）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有责任把为什么1981—2000年的二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有可能争取实现翻两番的根据讲清楚，使他们懂得十二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有可能是实现的，而1958年和1978年提出的一些口号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提倡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就是要抓住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使大家的思想认识得到提高，使学习一步一步深入。这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齐心协力地贯彻十二大精神，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很有必要的。

二十年翻两番，意味着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这当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但绝不是不可能达到的“高指标”。事实上，我国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3年开始，到1981年，尽管经济发展屡遭破坏，特别是遭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破坏，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的速度仍然达到8.1%。当然，这些年中有些数字有虚假的成分，但是总应该肯定，尽管我国经济的发展遇到很多曲折，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再拿1979年至1981年这三年来说，这是我国经济的调整时期，放慢了速度，但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仍然达到6.7%。可见，设想今后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不是什么“高指标”。

再从国外的资料看，苏联社会产品总产值从1956年到1975年的二十年间翻了两番，每年增长速度为7.5%。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认为不是很快的，我们设想的速度低于苏联达到的速度。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认为比较快的，从1957年到1970年，只用十多年时间翻了两番，每年增长速度为10.4%。后来由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速度下降。我们设想的速度也低于日本达到的速度。可见，我们的计划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不是什么“高指标”。

这些比较，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在这篇社论里，我们不准备更多地从这方面

去论述，而想着重从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个根本问题，来论证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供读者在学习和讨论十二大文件时参考。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958年的“大跃进”，是当时中央领导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被作为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而正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国经历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开始受到破坏。在那种情况下，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推测和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的认识很不足。尽管后来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去“大炼钢铁”，那也不是认真的经济建设。固然，1958年的“大跃进”，在经济上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绩，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工业部门和工业技术确是在“大跃进”中开始产生的，但是究竟不能不承认，像“大炼钢铁”那样的做法，的确是一场包含着很多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1978年初，提出“组织新的跃进”，不经过任何论证，任何测算，就要求搞“十来个大庆”，要求钢产量八年翻一番，甚至重提“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等完全不负责任的空想的口号，也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左”的指导思想的反映。那时，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多时间，清查工作尚在进行，大量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一系列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是非尚未澄清，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恢复，新的个人崇拜正在推行。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建设问题并没有被认真地加以研究，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在经过十年浩劫以后，急需休养生息，国家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也不可能忽然增加那么多出口物资，忽然吸引那么多外资来建设多少个“大型项目”。所幸的是中央及时发现这个错误，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才没有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更大的损失。

同1958年、1978年比较，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的第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坚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各个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我们党果断而妥善地解决了一大批长期遭到错误处理的重大问题，清除了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一系列

重大因素，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政治稳定的新时期。

经过必要的组织调整和作风整顿，党内生活渐趋正常化，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上得到恢复，集体领导代替了个人专断。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从1979年起就坚决地认真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精力，愈来愈多地集中于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开始得到清理，我国经济开始走上了适合国情、循序渐进、讲求实效、稳定发展的轨道。特别是我们党总结了长期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迈出了十分可喜的步伐。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才提出翻两番的设想。这个设想，不是哪个人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由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因此，我们完全有根据说，翻两番不仅不是1958年、1978年两次冒进的重复，而且恰恰是吸取了这两次冒进的教训提出的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它不是“高指标”，不是“说大话”，也不是“放空炮”，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不同的发展经济的规划或设想，当然有许多质的不同。拿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同1958年的“大跃进”、1978年的“十年规划”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所要求的发展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1958年要求钢产量当年翻番，即一年增长100%，这显然是荒谬的。1978年要求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以上，其中钢产量要求从1978年的3,178万吨提高到1985年的6,000万吨，石油产量从1978年的1亿吨提高到1985年的2.5亿吨，这也是主观主义，缺乏根据的。十二大提出了翻两番的设想，并没有提出任何没有根据的产品产量的增长指标。例如，原煤、钢等的产量，二十年只要求增长一倍左右，每年平均增长3%多一点，不到4%。这些都不能说是高指标，因为这些速度是过去经过正常的努力曾经达到，今后经过正常的努力也可以达到的。

另有一点不同的是，无论1958年或者1978年，都没有按照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提出要求，而是孤立地提出一项或几项指标，企图“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出现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奇迹，结果违反了经济规律，不能不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现在，计划部门反复进行综合平衡，既不搞“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也不搞“齐头并进”、“件件翻两番”、“处处翻两番”，而是按照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我国各经济部门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不

同的设想。例如，到本世纪末，钢的产量、能源总产量，只设想比1980年增加一倍，多了做不到；机械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则可能增长几倍；电子、信息、核能、石油化工、新型材料等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点不同，很足以说明翻两番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决定，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慎重地提出来的，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再有一点不同的是，过去提的那些指标，看重账面上的数字，而今天提出的要求，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这个前提是十分重要的。离开了经济效益来谈发展速度，就不能不带有虚假的成分。产值增长，仓库积压，人民没有得到好处，国家还受到损失，图虚名而得实祸，这样的蠢事我们不会再干了。正因为这样，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过去的经济计划，对人民生活的改善考虑得比较少，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不顾人民生活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因而不可能实现。现在的计划是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原则制定的。十二大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从长远看，翻两番的目标实现以后，我国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从近况看，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所改善，并将继续逐步得到改善。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这种主人翁的使命感，也是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的重要根据之一。

当然，现在提出的翻两番还不是计划，而只是设想。但是这个设想不是只凭过去的数字推演出来的。时代的条件不同了，基数不同了，质量、品种、效益和分配的要求都不同了，因此，翻两番虽然是可能的，但是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紧张的准备，采取一系列各方面密切配合的措施。十二大报告并不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个奋斗目标，它还提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抓住的重点，必须采取的部署，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十二大报告特别着重谈到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

革，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并且在整个八十年代在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基本建设，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进行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由此可见，实现二十年内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决不是像1958年和1978年那样的空想和胡来，而是以大量的扎扎实实、条理分明的工作为基础的。

我们分析了历史条件的不同，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经济工作方法的质的不同，就可以看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同1958年的“大跃进”，同1978年的“新的跃进”等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犯过“高指标”的错误，就不敢再提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在于它实行计划经济。经济不要计划，计划不要远景规划，那还有什么计划经济，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过去的失误的原因，不在于有了规划和计划，正在于根本没有真正的规划和计划。我们要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讨论，认清翻两番根本不是什么“高指标”，什么“冒进”，而是有科学根据，有现实的可能性的。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为把这个宏伟的蓝图变为现实而付出辛勤的劳动。毫无疑问，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不是空想，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像十二大所要求的那样，把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向广大群众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使全国各族人民像十二大报告所说的那样，“更加看清楚我们的光明前途，鼓起更大的干劲去迎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到来。”

受众的广泛还使得评论总是采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以毛泽东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为例：当年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制定了精兵简政的决策，以克服财经困难，巩固根据地。请看该文：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¹⁾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